



革命回忆录

在艰苦的岁月里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关于内蒙古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回忆录。通过作者亲身经历的回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内蒙古人民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全国解放前夕所走过的战斗历程。

此次以1962年第二版为基础，对原来的篇目作了少量调整。

在 艰 苦 的 岁 月 里

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210千 插页:6

1959年5月第一版 1962年5月第二版

1979年10月第三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0,001—37,200册

统一书号: 11089·24 每册: 0.91元

0202

目 次

血泪教训·····	杨植霖 (1)
在艰苦的岁月里·····	吉雅泰 (31)
第一次考验·····	毕勒格 (36)
平绥路地下·····	毕勒格 (49)
河套地下工作的一段回忆·····	王逸伦 (67)
红色的种子·····	田万生 (75)
英雄篇章·····	杨植霖 (79)
活跃在大青山上的一支游击队·····	王经雨 (127)
突围·····	田 心 (139)
大青山抗日活动片断·····	黄 厚 (148)
到延安去的路上·····	塔 拉 (159)
回忆蒙古抗日游击队·····	勇 夫 (178)
日记摘抄·····	李 欣 (190)
在战火中成长壮大·····	云照光 (229)
歼灭奇正山匪帮的战斗·····	道布吉 (273)

血 泪 教 训

杨 植 霖

余 痛 未 已

在革命中，监狱、战争我经受过好多，唯一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的反革命、反共事变最刺痛我的心。每一思及，总要把那时多次发生过的痛苦、忿怒勾引起来，甚至把那时流过的幼稚的眼泪重流出来。继而就会有无数的难耐的往事重现在我的脑海。尤其是关于我个人在那个时候的遭遇更重现的清楚。每重现一次，总从中得到不少教训，但是每当此时也总要经受一些刺心的痛苦，自然，这些痛苦也总是给我鞭策的。那时我狂热的心，总认为北伐军一定会得到胜利，我党所领导的革命一定能迅速成功，共产党一定要把一个落后的中国领导起来，并且使这个极度衰弱的国家和贫穷的人民，很快地强盛富裕起来，而且这个国度一定是一个没有阶级剥削、民族压迫的社会主义强国。我曾多次想过，到我三十岁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会好起来了，多么崇高的事业！我认为这一切都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想不到蒋介石竟然很快叛变，叛变后又那么狠。四月十二日的反共事变，很快地传到了遥远的绥远，归绥（现在的呼和浩特）城里的牛鬼蛇神和农村里的土豪劣绅顿时嚣张起来，毁辱共产党，镇压正直良善群众成为当时反革命们的唯一事业。我们的党、团组织被解散了，我

们的同志有的逃亡，有的被捕，有的被通缉，有的隐匿起来。我所希望的强盛祖国、富裕人民、没有阶级剥削与民族压迫的社会主义不知何时才能实现，我所依赖的党、团领导被破坏了。我的希望不仅受到莫大打击，而且还面临着难以忍受的极端的反共污蔑。我那时（十六岁），少小的心灵好似被毒箭射伤，而隐痛又无处可诉，只有痛苦地暗自悲泣。也许是年纪小感情十分脆弱或是创伤过深短时难以恢复的缘故，从那时候起就给我永远留下了痛痕，直到现在还是余痛未已。这是最大的最有教育意义的一课。让我叙述一些其中的事情吧。

黑暗社会的冲击

一九二五年一个夏日炎炎的中午，我由毕克齐镇回到了我的家乡——什报气村。这次回家是和父亲商量有无力量继续让我在高级小学读书的问题。毕克齐镇区立小学，只要自带米面，花些燃料钱和少数零用钱就行，就是这样我还是难以为继。学校规定全体学生出外，都要整队，一律穿蓝色制服，学生自己住的宿舍，由学生自己生火取暖。我因家里不能及时把米面送去，常被地主富农的子弟们指责我沾了他们的便宜，我做不起蓝色制服，老看着打着鼓吹着号整队出去的同学心里难过，因我在家里从来没有生过火炉，不会生火炉常被同学们奚落：“你看我们，别那么笨！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一天里指这个说那个，我和这些人在一起读书很痛苦啊！这次商量，我的父亲虽然肯定了我继续读下去，但是我知道一个下中农的家庭是没有力量让我持久下去的，经济上对我的压力始终是个发愁的问题。但是，这次回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使我有机会听到革命大道理，从这些大道理中我已约略理解了人们贫穷的病根。

虽然年岁仅有十四岁，但从亲身的体验和目睹耳闻，对于当时的黑暗社会，由难以理解而到极端的厌恶。当时给我刺激最大的是我最普遍直接感受的事情：所有农村都有地主，没有一个地主不做坏事，而且互相联合起来做坏事，其中有一些地主、恶霸特别坏。记得我们村里有个姓郝的地主，春夏秋冬总是尽干舒服事，冬天待在家里吃好穿暖不出门，夏天东荫凉搬在西荫凉，啥事也不干，整天看谁家里有漂亮姑娘、媳妇，总要设法缠到手。他在村中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有人稍有不顺从的意思，就往死里整，特别对他当面表示不同意的，即大喊一声：“反呀！”吓的人们如鼠见猫，不敢动弹，真是可恨可怕。后来看到这种现象各个村里都有，而且在互相比赛着。印象最恶劣最难忘的是在农村中凡有迎神赛会等人多热闹的场所，人们正在欢喜快乐的时候，这些人就发起狂来，他们横行无忌，老百姓称之为“放膘”（好似马有了膘狂奔的意思）。典型的样子是身穿长袍，面戴眼镜，手提马鞭，在妇女群中，冲来闯去，尽情地调戏妇女；如有家人丈夫稍加阻止，就斜瞪起眼睛，骂人打人。有时这些地主少爷们也因争风吃醋互相打闹，丑态百出。常常把人们欢欢乐乐的场面弄的悲苦而散。这些很说不理的恶劣事态在我的脑海中经常回旋，使我畏惧愤恨。

官场怪事虽然见得不多，但印象极深。最使我憎恶而难忘的是关于禁烟问题。从我能记忆算起，每年总要出禁种大烟的布告。尽管禁烟布告贴满了墙，鸦片烟还是大种特种。但是迟也不，早也不，只等到鸦片烟收浆的时候，反动政府就派人查禁来了。老百姓毁了吧，什么也不能种了；不毁吧，明知是一些把戏，但又怕惹下禁烟的大人们真给禁了，一年到头什么也拿不到。于是好话讲了千千万万，直到答应按“禁烟罚款”办理才放

下心来。这又是一张鱼肉乡民的分赃图，是农村的地主与城市官僚结合起来宰割农民的活报剧。禁烟委员带一批人马，丈量烟亩，农村的地主站在地边叫喊着。大烟地丈量的很认真，这是诈索的毒辣手段。农民为了减少付出罚款，拼命地花钱，要求减少亩数；地主们便乘机向每户农民收取大量烟土、款项、猪鸡等物，给禁烟委员花袖筒钱，送烟土、送姑娘睡觉，他们便从中分掉一大部分。关于这种鬼把戏，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绥远都统马福祥的干儿子的故事。因为马福祥排行第四，农民都称他“马四大人”。他的这个干儿身体很肥大，差不多每年当禁烟委员，农民们也称他“马四大人”，或有人背后也称他为干马四，即干儿马四大人。干马四每年下乡禁烟，每次把剥削农民的脂膏满载而归。干马四以后也换过很多委员，但都和他的作风一模一样，所以那时老百姓对衣冠楚楚的所谓官人，认为都是一窝丧尽天良的豺狼。

我的村子是蒙汉杂居的，据老人们谈蒙古人的生活有前后两种情况的变化：在他们牲畜多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非常悠闲自得的，最使人羡慕的是青年人骑着马快乐地唱着情歌《海利儿花》。歌词是：“（一）上河里流的五色水，下河里流到江里去，前世上结下好婚姻，半路地里被冲散去；海利儿花，乌里银气花，半路地里被冲散去；（二）黑马草场在村西，想的你盼的你泪悲啼，盼的你盼的你云里无雨，吾怨的君子没怨谁，海利儿花，乌里银气花，吾怨的君子没怨谁；（三）太阳一落点着个灯，盼的你盼的你打罢五更，只说你回头到我家，谁想你一去无音讯，海利儿花，乌里银气花，谁想你一去无音讯。”这是多么美丽的情诗！骑着马飘然唱着情歌，又是多么愉快的生活啊！但是现在改了样子，歌唱的兴头很少了。这里的牧场是逐渐开垦的，开垦后

蒙古人的牧场就逐渐缩小了。在失去牧场的过程中，又没有转向农业生产，即便转变也很困难，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没有几代是转不过来的。就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牧业由减少到没有，农业又不会经营，形成无业之人，生产赶不上去，生活失去了保证，许多蒙古人贫穷了，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向汉人地主借债，债多了卖房卖地，甚至逼得人流离失所，以至挺而走险。已经把蒙古人弄到这步田地，但总还听到有人说蒙古人的坏话，特别是地主们说蒙古人不会种地，就应该把土地让给他们。我记得很清楚，我的邻居一个蒙古寡妇老人叫刚庆架，他有一个儿子叫纳生，由于务农不会，放牧没牧畜与草场，每日待在家中，生活很困难，先靠变卖过活，后来只得向人借钱维持。他借了姓徐地主的钱，因无钱可还债，怕逼债常常躲藏在外，不敢回家。按村中规矩，在元旦夜间，是不讨债的，纳生选择了这个时刻，偷偷回家和母亲过年；不想徐姓地主正好等他刚刚回到家中，还没有坐定，就突然闯进去逼债，因无钱还债，就把他的锅拔去，门也给摘去了。刚庆架老人因和我母亲平日关系不错，急急忙忙跑去，向我母亲哭诉：“大年时节拔了锅，家里留下一个大黑窟窿，好象拔了我的头一样，心里好难过呀！”我母亲和她老人家一同流泪。这件事给我印象最深，每次回忆起刚庆架老人悲苦的样子，总有一股难以形容的苦味。

在城乡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下，大批的人挺而走险，土匪遍地，没有一天宁静的日子。一些有野心的恶霸豪绅，又在趁机弄势，到处收编土匪，收罗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特别是地痞流氓、恶棍做为爪牙，顷刻之间又变成什么团长、旅长。官匪之间的关系，任何人都看得明明白白。

军阀、地主的军队就是老百姓的灾难，什么西路军（马福祥

的回族军)、晋军(阎锡山的军队)、国民军(冯玉祥的军队)、奉军(张学良的军队)互相接替,以及地方地主的民团之类,都是老百姓的太上皇。人们最恨西路军,有“宁让土匪住三天,不愿西军打一街”之说,对奉军称为土匪王,对地方武装称作地头蛇,对国民军与晋军也有些说法。这些军队打人骂人那是极平常的事,最可恶的是没有止境地向老百姓勒索。天哪!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去啊!

当时一切人,凡是带上官字的,都能欺负老百姓。我记得一次我牵驴到井槽饮驴,到我村催银粮的县衙门的衙役,也去饮驴。他是后去的,但打走我的正在喝水的驴,要先饮他的驴。这样不说理我就和那家伙争吵起来,直至打起架来,他打我我也打了他。这家伙说他丢了公款讹诈我,后来村里人说我是个城里的中学生诈唬他,全村人又给他说了好话才算了结。我感到这是一个到处不讲理的黑暗世界,我盼望有什么办法消灭这个黑暗世界,而且有一个光明的世界来代替它。

“五卅”惨案引起的反帝狂涛涌到了塞外。向日本纱厂斗争的工人代表顾正红被英国人杀死,而且许多中国人也因这件事被英帝国主义者屠杀,这件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那时回到村里的学生有的去我们村中愤怒地宣传,在我们村里动员人们给上海工人斗争做后盾的杨曙晓更是苦口婆心一天价讲说。他把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和我国的军阀官僚不能给人民作主的事实,不厌其烦地告诉全村的人们,许多农民听的落泪,可是村里的地主们很不喜欢这些话,尽给打散鼓,说什么国家大事,我们老百姓能有什么办法?并且指责杨曙晓是胡闹,是挑惑群众,他们甚至出面干涉他的活动。我们的同胞被外国人无理杀害了,他们都不表同情,这还有什么心肝!有什么骨气!

旧社会的种种黑暗事实是看不完数不尽的，内忧外患冲击着每一个有良心的人，当然也冲击着我那颗少年的心。人们都无法生活下去，都需要革命，都希望改变社会现状，冲向黎明的革命呼声高涨起来了。

“五卅”运动的革命影响

我满怀敬意地打听那个激昂慷慨宣传“五卅”事件的是什么人，村里人告诉我他是吉雅泰的一派人。吉雅泰同志（那时绥远省共产党的负责人，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内蒙古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的村子叫三两村，距我村——什报气村仅三十华里，因他的姑母在什报气村，他常到什报气来，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他就走亲戚之便，就在我们村开展起工作。村里的人都说他是闹革命党的，我很愿意知道革命党究竟搞些什么事情，就和杨曙晓接近起来。杨曙晓不但给我谈帝国主义的问题，而且还谈到不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官僚，帝国主义是反不下去的；如果要把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都打倒，就必须有个好的领导。起初他不谈谁能领导起来，直到他看出我的急切要求时，才讲出是共产党，他特别讲到共产党在打倒他们以后，就会建立起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那时什么地主、恶霸、土豪、劣绅，都一扫而光了，天下变成劳动人民的，人们都过着安乐富裕的日子。他的话打动了我的心，最打动我心的是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事情，更没有地主、豪绅、恶霸了。他也讲到要那个社会，要有很多斗争，要有牺牲。我当时想如要能铲除这个罪恶社会，那多么好啊！因此，我就向他表示：只要能改变了这个万恶的旧社会，我愿意出一切力量。这样他就提出介绍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开始找到了光荣斗争的道路。

一九二五年的下半年，我到归绥投考了五族学院的中学部。吉雅泰同志的机关设在归绥城中东五十家街的巧尔气召内，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冯玉祥统治着绥远，冯对国民党、共产党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所以挂的是国民党的牌子。我有机会经常到吉雅泰同志那里，听些革命道理，接受些指示，我的思想逐渐开阔了，参加群众运动的斗争也多了。看的文件有《犁头》、《向导》等，我们党提出的口号也比较熟悉了解些了。听到看到人们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官僚”、“铲除豪绅恶霸”的口号是最痛快不过的，人们对口号中提到的坏东西是多么痛恨啊！

日子过的是很不平凡的。许多青年都被大时代的曙光感召着，他们向往着革命的广东，那里有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革命。有的人偷偷地去住毛主席办的农民讲习所，有的人偷偷去住黄埔军校。我也要求去住黄埔军校，因为年岁小没有让去。归绥各个中等学校，去广东寻找革命出路成为一时之风。各个学校当局知道这件事后，除了讲话劝阻外，五族学院增加了讲三民主义的课程；但是许多人想的是共产主义，外逃的空气还是停止不下来。为防止学生逃走，各校规定不准学生到校外活动，并且抱怨吉雅泰同志煽动青年。

在这种形势下，真是痛快极了。但我个人的不幸又来了：父亲卖光了家中的粮食也供不起我再上中学，父亲含着眼泪痛苦地让我向学校写了退学书，这年终，我忧心愁愁地背着铺盖回家来了。在回家的路上腿软的几乎走不动。我的村子靠山很近，回家后每天上山砍柴，冬天的刺骨寒风猛吹着，冻僵的手一碰就流血，尤其背着柴下山更有难忍的滋味，两腿酸软，两眼乱冒火花，耳中轰轰乱响，满身是汗，口中干渴异常。我，这才更清楚

地认识到劳动的价值和剥削者的可恶。

我被刺痛的心，想起了党，想起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想起了真正和我一心的人，我想找吉雅泰同志帮我想办法，要求给我个斗争的去处，或学习的机会。吉雅泰同志是蒙古人，我是汉人，按当时水火似的民族关系，蒙古人和汉人是不能真正谈心的。但我们有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有党的联系，我便毫无疑问地找他想办法，他便关切地给我出了主意。

一九二六年初，吉雅泰同志的表兄赵某牵了一头毛驴，我们轮流骑着进了归绥城。在见面之初吉就说他已把一封密信交给了五族学院的教务长杨绍萱（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党员）。杨那时是进步分子还不是党员，他很同情共产党。由于杨绍萱的从中周旋，我不久接到一个通知，说我成绩优良，念其家贫，废学可惜，可入师范班，公费待遇。这一下喜出望外，于是我又很快回到学校读书了。

这件事给我的教育很大，帮助我的人都是赞成共产主义的人，这更加启发了我的阶级觉悟。我想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多么伟大啊！

恢复友好的故事

我能以公费生资格重新学习的这件事，引起了我父亲的最大诧异，他老人家满腹怀疑莫能自解。归绥城距什报气村仅五十华里，城乡之间往来十分便利，一次我从城中回家去取衣服，父亲以又喜又疑的态度和我作了一次长谈，就是这次长谈恢复了他和一个蒙古老朋友的友谊。

“咱们村里蒙古人和汉人是不和气的，我总想不明白为什么蒙古人能帮助你解决这么大的困难？”

“我们和一般人不一样，所以蒙古人能帮助我办这么大的事。”

“吉雅泰用什么办法帮助你能住官费学校？”

“他在我的老师面前给我说情，说我学习成绩好，家庭贫苦，有培养前途，废学可惜，应该让我官费学习。”

“你们之间为什么这样密切，没有什么含糊的事吧？”

我听得这些问话有些奇怪，可能父亲怀疑我们之间有什么不正当的结合或者我接受蒙古人什么条件，和蒙古人搞成一气，搞些不利汉人的事情，因此，我就直接了当地回答了他：

“爸爸，你的话中有话，我们没有一点不良行为。”

“你要注意，汉人要是和蒙古人很亲热的话，总有人要在背后议论，说是没有个界限。”

“是不是说，要是很亲热了，就不成汉人了？”

“嗯！”

父亲带着疑惑而首肯的意思哼着。

“爸爸你想错了，我们就是要不讲界限的，我们都是新思想的人了。”

父亲更加疑惑了，他给我就讲述村里过去的蒙汉人纠纷的故事。讲到村里的武德厚和蒙古人因争土地弄成人命，武德厚打死一个蒙古人，被判无期徒刑，大赦出狱后成了残废；蒙古人成成和郝罗毛争地，双方手拿大刀，各不相让，全村人都去劝阻等等。越讲越多，我越听越怕越紧张，他说咱们村里蒙古人和汉人不和，有钱的欺负没钱的，这是老天爷安排下的，世世代代是不会完的。他说这话的意思，好象是富人欺负穷人，蒙古人与汉人不和是天定的，改变不了的，我听得急不可耐，便冲口急叫起来：

“爸爸！你不要讲了，在我们手里就要消灭那些坏事情！”

“消灭！好大口气，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凭你拿甚消灭？

“拿‘主义’去消灭。”

“主义？过去可想过不少主义，都没有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的‘主义’和过去的大不相同。”

“你们现在是什么主义？”

“共产主义。”

“是不是共产党？”

“是。”

“啊呀！天呀，你说的是红党吧？人家都说红党是俄国的，把人们都弄穷了。”

父亲愣了一阵，变颜失色地说着。

我决心向父亲讲出秘密，索性把有关红党的事情，凭我所知道的，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他老人家听的很感兴味，谨慎地向屋外探望了一番，看了看外面没人听，然后低声地又问：

“这共产主义、共产党有个老祖宗没有？”

“当然有，马克思、列宁就是他的老祖宗。”

“他们当真能解决人跟人、人压迫人的事吗？”

“能！你看吉雅泰帮我办事就明白了吧？”

“唉！早有这个主义，我和你仁义大爷还不至于闹到现在这个天地呢，唉！”

仁义子比我父亲大几岁，按村里礼节，我们应该尊称他大爷。我知道村里有个蒙古老汉叫仁义子，人们称他“老仁义”，但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和我父亲之间有什么故事。为了弄清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瓜葛，我把话题转到了这上面。

“你和仁义大爷有什么事情妨碍着呢？”

“别提了，一言难尽。过去我们是好朋友，快三十年不来往

了，唉！”

“你们有什么仇不来往了？”

“没有，一点也没有，而且还很好；就是因为我是个汉人他是蒙古人，就不来往了。”

“爸爸，请你老人家详详细细讲一下吧，这里边很有文章。”

父亲眼泪晶莹地讲起来了。

“还没有你们的时候，我和你仁义大爷都没出二十岁时就是好朋友，好到形影不离。我会弹三弦，他会拉四胡，我比他弹的好，我一引头他就跟着拉，接着就有人唱起二人台，真是快乐啊！”

老人家说时似想从墙上取下那只蒙了厚厚一层灰尘的三弦。

“爸爸你说吧，很有意思，我想往下听。”

“说什么呢，也算一件伤心事吧，说起来怪没有意思的。”

“有意思，快说吧！”

“我们到了二十岁左右，两人都好玩枪，经常上山打猎。他的枪法好，我差些，因此我常给他盯坡（阻猎物临近射击处），他常常趴在大石头后面等着，每次打到野生时，我们总要乐的蹦半天。有一次在白石头沟山上（距什报气村十里多）打着一头大头羊，有一百二十多斤重，两个人抬不动，我们剥了皮，别的抛掉了，每人只背一条大腿走回来，全村的人都来吃肉。”

父亲说的很得意，但说到这里又停下了，神色迷惘，喜中带悲。

“再往下讲，你们多亲密愉快呀！”

“以后就是不愉快了。”

“为什么？”

“还不是蒙呀汉呀的！”

“这就是我们要努力消灭的问题，快讲吧。”

“正在我们很要好的时候，村里有一次蒙汉大纠纷，也可说是大斗争。村里姓郝的姓徐的连咱们姓杨的，联合起来和蒙古人争地，领头的都是村里的大老财。那时我成了汉人指责的对象，说不该和蒙古人要好，有人甚至拿杨姓的祖宗和蒙古人历史上打仗的事来相劝，我受到压迫，我们没吵没闹就不来往了。这个蒙汉界限真害死人！”

老人家讲到这里，很难过，好似含着最大的友谊与遗憾，带着不愉快的友爱要进棺材了，言下不禁哀伤之至。

“爸爸，你和仁义大爷并没有距离，只是旧社会给你们闹的。你快去，现在就去和仁义大爷言归于好吧！”

“孩子，你们的时代来了，我去，我一定和他言归于好。”

真的，过了一天，仁义大爷也来我家了，两个老人重新亲热起来，恢复了他们少年时代的青春友谊。特别到冬天的时候，两个老汉促膝围坐在火盆旁边，一谈就是半夜。其乐融融，直到他们终老之时。劳动人民的感情是没有民族界限的。

塞外的革命大风暴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摧毁旧中国的恶势力。我们党挑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展开了斗争。从“五卅”惨案的宣传鼓动起，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把群众鼓舞起来了，并且有组织地进入了实际斗争。

一九二六年的前半年，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都相继组织起来，这些群众团体，都在我们党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工作。那时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不仅喊的很响，而且也逐渐具

体化了。

在反帝方面，最先是反对帝国主义在华制造惨案屠杀中国人，取消袁世凯和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取消租界地，取消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除积极声援沿海各省和南方各省的反帝斗争外，在绥远最突出的是抵制日货运动。那时归绥城里的大南街有两个经营日本货物的商号，一个叫正兴时，一个叫盛兴时。这两个商号曾几次被愤怒的学生与市民捣毁了，其余的商店，凡是卖日本货物的也都一律查封登记，那时谁要与日本货物有些关系，那算是臭极了。帝国主义成了人们的眼中钉。当时在全省各地也有一些外国的传教士，他们从精神上麻醉中国人民，为帝国主义辩护，而我们则是对凡有利帝国主义的宣传，就给以痛击，毕克齐镇的耶稣教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被捣毁了。反帝的劲头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反封建是当时革命浪潮的中心。首先突出地提出反对军阀官僚、土豪恶霸，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对旧制度旧作法的宣传上，起初还没有具体提出打倒什么人，但许多有劣迹的人，已经是灰溜溜的了。

具体斗争，从城市到农村逐渐展开。从以下一些大事件中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斗争梗概。

声势浩大的反对清丈土地斗争。

一九二六年的晚春时节，绥远都统衙门的政务厅，在归绥县设立了清丈局，专门丈量已垦未垦的蒙、汉人的土地，丈清以后，每个土地所有者，都得付出一笔执照领取费。这是一个敲取民财的诡计，蒙古人、汉人都在被搜刮之列，这就激起了广大蒙、汉人民的愤怒，展开了取消清丈局的斗争。共产党站在这个斗争的最前列，领导这个斗争。